

十字军东征

沈敏华、程栋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十字军东征

沈敏华、程栋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字军东征/沈敏华,程栋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3

ISBN 978-7-5458-0017-3

I. 十… II. ①沈…②程… III. 十字军东征(1096~1291)—研究 IV. K5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3627号

责任编辑 梁健民
技术编辑 丁多
装帧设计 许非

十字军东征

沈敏华 程栋 著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本 889×1194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245 000
版次 2009年3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58-0017-3/K·1
定价 24.00元

目 录

第一章 十字军东征前的欧洲与西亚、北非	1
1. 11 世纪西欧的商业复兴与扩张	1
2. 西欧经济复兴与社会矛盾	6
3. 克吕尼改革运动	11
4. 十字军东征前的拜占庭帝国	20
5. 基督教东、西教会的决裂	24
6. 法蒂玛王朝的兴衰	28
7. 塞尔柱人的崛起与扩张	32
8. 十字军东征前的耶路撒冷	34
第二章 克勒芒宗教会议与农民十字军	39
1. 教皇乌尔班二世与克勒芒宗教会议	39
2. 农民的十字军	45
第三章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54
1. 骑士十字军启程东征	54
2. 攻占尼西亚与爱德萨伯国的建立	63
3. 安条克之战	69
4. 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	80

第四章 西亚的十字军国家与宗教骑士	89
1. 十字军国家的建立及其初期的扩张	89
2. 十字军国家概况	98
3. 宗教骑士团	104
第五章 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111
1. 赞吉王朝的兴起和爱德萨的陷落	111
2. 圣·贝纳德的圣战游说和第二次十字军东征	113
3. 萨拉丁的崛起	128
4. 阿尤布王朝的建立	132
5. 伊斯兰世界的吉哈德	133
6. 哈丁战役与耶路撒冷的陷落	138
第六章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	144
1. 英、法、德三国与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发动	144
2. “红胡子”腓特烈命丧小亚细亚	150
3. 攻占阿克与阿尔苏夫战役	153
4. 狮心王理查与萨拉丁签订和约	159
第七章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162
1.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兴起	162
2. 威尼斯与十字军	164
3. 血洗君士坦丁堡	169
4. 拉丁帝国与尼西亚帝国	174

第八章 第五、第六次十字军东征	178
1. 惨绝人寰的悲剧——儿童十字军	178
2. 为尼罗河水吞噬的第五次十字军	180
3. 腓特烈二世与罗马教廷	185
4. 第六次十字军东征	188
第九章 最后两次十字军东征	192
1. 耶路撒冷的再次陷落与法王路易九世	192
2. 劳民伤财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	196
3. 穷途末路的第八次十字军东征	198
4. “十字军战魂”在东方的消失——阿克的陷落	205
第十章 十字军东征的后果和影响	208
1. 教皇权势的膨胀与基督教文化的繁荣	208
2. 十字军东征对西欧文化的影响	218
3. 西欧社会的变革	230
参考书目	236
后记	240

第一章 十字军东征前的欧洲 与西亚、北非

1. 11 世纪西欧的商业复兴与扩张

中世纪早期的西欧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它被分割成一个个自给自足的狭小的经济政治圈，罗马帝国盛期的那种大一统局面和万国来朝的君临气势早已成为过去。在欧洲“黑暗时代”里，绝大部分的民众是农奴。在少数的手工匠中，有一些是流动的工匠，但绝大多数是工匠兼农奴，他们用一部分时间耕种自己的小块土地，另一部分时间为社区和领主生产粗糙的手工业品，他们同样过着农奴般的穷苦生活，有着同样可怜的生活条件。在那样的社会中，商业降到了最低限度，“我们找不到专门的商人。没有商人存在，或者说，除了犹太人以外没有商人，从加洛林初期起，只有犹太人进行常规的商业活动。正因为这个原故，‘犹太人’与‘商人’这两个名词几乎成了同义语”〔1〕。的确，“犹太商人在中世纪早期的有限贸易中，享有非常大的份额。在西欧广大内陆世界，他们控制了差不多所有的国际贸易独占权……他们从东方到西方；又从西方到东方，从陆路到海路，他们从西方带来了奴隶、阉人和各种皮毛，又从东方带来了各种香料、芦荟、樟脑和贵重的物品（珐琅器皿，锦缎织品，象牙制品等等）”〔2〕。但犹太人的顾客极为有限，主要是当时的贵族，他们的经济作用只是一种附属的作用。

使西欧退到农业社会的另一因素是阿拉伯帝国的崛起，伊斯兰占据了地中海贸易的优势。汤普逊认为：西欧长期的经济落后，很大部分是因为伊斯兰占着地中海地区的优势，导致基督教欧洲的航运和商业不得不依附伊斯兰们的鼻息。事实也是如此，中世纪初期，日耳曼人进入西欧后，地中

〔1〕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页。

〔2〕 I. W. Raymond, *Medieval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New York, 1955, P31—32.

海仍起着传统的沟通商业、传播文明的作用。5至8世纪之间,叙利亚人的航海业仍活跃在西方各港与埃及、小亚细亚各港之间,日耳曼王国的国王仍使用罗马金币索里达,索里达是地中海地区经济统一的媒介和象征。伊斯兰扩张和征服了地中海区域的大部分后,上述情况发生了变化,“地中海地区不再是东西方世世代代联系的纽带,而成了一个障碍……从8世纪初起,在这个伟大的海运的四边形地区,欧洲商业濒于绝境,整个经济活动这时转而趋向于巴格达”〔1〕。在地中海的沿岸地区,形成了两种文明,两种信仰的敌对世界,它们互相对峙,有时还处于交战状态。“萨拉森〔2〕海盗不断侵犯里昂湾沿岸,热那亚海湾以及多斯加尼与卜诺洛尼亚沿岸,他们在878年攻占了叙拉古,此后完全控制了西西里岛;935年和1004年两次劫掠了意大利的比萨城,又于985年毁灭了巴塞罗那”。11世纪初以前,这些地区与萨拉森人在西班牙及非洲的港口没有丝毫交通的痕迹。但西方与东方的贸易与交往并非就此完全中断。那时,“西欧的朝圣者还是经历千辛万苦,或经伊比利亚与色雷斯,或渡过亚得里亚海达到希腊南部,再由巴里乘希腊船只到达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仍是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最大的城市,它既是一个政治首都,也是一个巨港和第一流的工业中心,它与黑海海岸、小亚细亚、南意大利以及亚得里亚堡、黑海沿岸地区保持着联系……当它强大时,它能够在伊斯兰面前,维持对东地中海整个海域的控制〔3〕。

到10至11世纪,封建的欧洲经过了四五个世纪的休养生息之后,开始蠢动起来,西欧社会内部的商业精神逐渐复苏,逐渐形成了南北两端两个商业中心,一个是北欧地区即北海和波罗的海地区,一个是南部以威尼斯为首的意大利诸城市。这两个商业中心形成南北两股商业压力,一方面不断渗透着自然经济状态下的西欧,另一方面又使西欧受到外界财富的强烈吸引。

北欧地区是斯堪的那维亚人的老家,他们的传统谋生手段都在海上:捕鱼和做海盗。汤普森说:“从古代以来,北欧人一定曾是以航海为业的民族,他们好战成性,一遇机会,便很自然地放弃了捕鱼和捕鲸事业而转向海盗行为。”“北欧人”从事航海、捕鱼、捕鲸、贸易、战争以及在需要时还干海盗行为。但是,北欧人并不是经常以野蛮的海盗姿态出现的。他们常常也

〔1〕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页、第3—4页。

〔2〕 萨拉森人(saracens)是中世纪欧洲人对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称呼。

〔3〕 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2页。

是和平的经商者,只在必要情况下,才采用战斗方法。他们的生活环境和活动方式,培养和造就了他们特殊的性格,即具有相互合作的集体精神,不畏艰难的冒险精神,当然也包括商业冒险精神。凭着这种精神,北欧人向西、向南攻击了爱尔兰、英国、法国的高卢和意大利沿海,掠夺了亚眠、卢昂、巴黎、南特、波尔多、马赛和比萨。“跟着外侵团的龙旗而来的,是北欧载货的船只以及船上的和平商人。这些船只运载着挪威的毛皮和冰岛的鱼类来交换英国的羊毛、蜂蜜、麦芽和麦子。支斯德尔、布里斯多、雅穆斯、伦敦同丹麦、挪威和冰岛的交往遂发展起来”〔1〕。9世纪时,法国沿海地区和沿河的城市大都遭到北欧人的抢劫,但北欧外侵团也带来了商业,他们以毛皮和蜡来换取日耳铁、法里西安的布匹以及莱茵兰的葡萄酒。在东面,北欧人通过芬兰湾,经诺夫哥罗德和第聂伯河到黑海,促使俄罗斯人发现了一条连接伏尔加河与第聂伯河的水路,被称为“发兰琴路”,“发兰琴”意为“北欧漂泊者”,特指9世纪时那些劫掠波罗的海的北欧人。“发兰琴路”成为北欧和东方之间的交通纽带,这条路线把拜占庭、巴格达同波罗的海地区连接了起来。在欧洲社会的发展中,北欧人的扩张和商业活动给当时处于割据状态中的欧洲带来了一种具有同一性的联系纽带,其中最具体的也许是商业的统一。对此汤普逊评价说:“自从罗马帝国衰落以后,从来没有看见过可与伦比的国际商业的交换。北欧的毛皮、鲸鱼和海象牙是在黑海口岸、基辅、诺夫哥罗德、阿斯脱拉罕出售,来换取东方的丝绸、糖、香料、软膏、化妆品以及各种奢侈品。从冰岛来的鱼类和从格陵兰来的鲸鱼是在比斯开湾港口和西班牙港口出售〔2〕。”亨利·皮朗也说,北欧人充沛的精力促使他们同时向西部欧洲和俄罗斯进行抢劫和征服的冒险……由于他们,商业的潮流从拜占庭和巴格达开始,经基辅和诺夫哥罗德贯穿俄罗斯,一直延伸到北海沿岸,在那里产生良好的影响,在历史上几乎没有比希腊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高度文化以斯堪的那维亚人为媒介给予欧洲北部的那种影响更为奇怪的现象〔3〕。北欧人恢复了东西方的接触,使佛兰德尔、布鲁兰德、根特、伊普雷、里尔、阿拉斯等地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他们建立了许多据点,修建了码头和港口,以商品为媒介,沟通了东欧、南欧、中欧、北欧与西欧,并为广大民众展现了一个精彩的外部世界。人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商业经营所需的冒险和进取精神,这一精神融入了欧洲文

〔1〕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45页,第346页。

〔2〕 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56页。

〔3〕 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9页。

化,成为整个欧洲精神遗产的一个部分。

以威尼斯为首的意大利诸城构成了欧洲南部的重要的商业中心。意大利诸城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一,意大利地区有较为深厚的商业传统和有利的地理位置。其二,意大利地区封建化程度较低,庄园制和贵族阶层从未获得如西欧其他地方那样大的力量,甚至连名义上的王权也没有,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贵族势力弱小。因受到罗马和拜占庭城市生活传统的影响,意大利一些城市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市民,这些市民往往同时也是周围乡村的贵族,他们拥有庄园,占有大量的财富和房地产,进行商品买卖,这使得城市与乡村联系密切。城市自治不仅赋予市民以自由的权利,同时也大大推行拓展商业的政策,有利于意大利一些城市的发展。其三,意大利的一些城市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活跃的商业活动为意大利诸城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尤其是威尼斯等城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还发行了信誉高、通行于欧洲的国际货币。其四,意大利诸城拥有活跃的商船队和较为强大的海军力量。自古以来,从事海上贸易,造船航海是首要条件。威尼斯、热那亚、比萨、阿马尔菲等城在海上贸易过程中,都建立起了相应的商船队和保护商船的海军舰队,威尼斯的舰队除维护本土和为商船护航外,还经常补充拜占庭海军的不足,以增强其与拜占庭帝国的商业联盟。意大利商业城市资金的雄厚和海上力量的强大,使他们进一步膨胀了其开拓广阔市场,垄断东西方贸易的野心。

早在公元8至9世纪,意大利的一些城市已开始与犹太人竞争,在穆斯林与拜占庭之间充当中介人,与穆斯林和拜占庭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商业联系^[1]。9至10世纪时,意大利南部兴起了一大批城市,如那不勒斯、加埃塔、阿马尔菲、萨累诺、巴里、威尼斯等城,它们都承认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致力于与拜占庭、地中海东部城市及西班牙、埃及和北非伊斯兰各国的交往和通商^[2],而威尼斯在10世纪之前已经走在西欧所有航海城市之前^[3]。除了威尼斯外,阿马尔菲也是地中海商业贸易的聚集地。“从这里,商人们的足迹踏遍了地中海沿岸,从西班牙到黑海,从埃及到阿德里亚堡,从北非到西西里,到地中海东岸。阿马尔菲从拜占庭获得贸易特权,在意大利经销从东地中海市场,尤其是从君士坦丁堡集市上获得的东方产品和奢侈品。对阿马尔菲的商人来讲,最有利可图的是与北非穆斯林的贸

[1] I. W. Raymond, *Medieval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New York, 1955, P33.

[2] I. W. Raymond, *Medieval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New York, 1955, P51—52.

[3] I. W. Raymond, *Medieval Trade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New York, 1955, P69—79.

易,尤其是与法蒂玛王朝的埃及通商”〔1〕。公元10世纪,意大利的伦巴德地区在威尼斯、阿马尔菲等城的影响下出现了商业生活,并迅速从帕维亚扩展到附近的城市。经济史专家雅克·伯纳德认为,10世纪,意大利经历了第一代商业城镇的成长〔2〕。意大利城市所拥有的强烈的进取精神和谋利的欲望,使得他们不顾宗教的信仰束缚,甚至抛开宗教信仰去追求商业利润。当时的一位天主教主教曾坦率地宣称:与伊斯兰埃及的商业贸易,“总是给我们带来利益与荣誉”〔3〕。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意大利诸城的商人已经在君士坦丁堡、安条克、耶路撒冷,可能也在北非的一些港口城市建立起了侨居地。这些侨居地的获得大都是以当地君王给予的特许证而形成的,并非靠武力获取〔4〕。至12—13世纪,威尼斯、热那亚、比萨在地中海沿岸建立起了巨大的商业据点网络。

自11世纪初起,意大利的城市,开始是热那亚、威尼斯,尔后是比萨等城开始向穆斯林发起攻击,以争取地中海区域商业活动的控制权。1002年,威尼斯协助拜占庭舰队从巴里驱走了萨拉森人,不久比萨人与热那亚人从萨拉森人手中夺取了第勒尼安海的控制权;1015年或1016年起,比萨与热那亚结成同盟,远征撒丁岛,把穆斯林势力逐出了撒丁岛;1034年,热那亚和比萨一度夺取非洲海岸的博纳;1062年,比萨人攻入西西里的巴勒莫港;1065年,热那亚人的舰队已在利万得进行商业性的护航〔5〕;1088年,比萨、热那亚和少数南意大利的城市结成结盟,在教皇维克多三世的鼓动下,向北非的梅迪亚城发起猛攻。“热那亚人和比萨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和教会的士兵,他们相信看见了大天使加布里埃尔和圣彼得领导他们同异教徒战斗。只是在屠杀了穆罕默德的阿訇们和抢劫了梅迪亚的清真寺之后,他们才签订了一项有利的商约”〔6〕。梅迪亚之战已被笼罩上了宗教热忱,为庆贺这次远征的胜利而建造的比萨大教堂象征着航海事业给他们带来的财富,也象征着比萨人的宗教狂热。这次远征,在历史上被人们看作“十

〔1〕 Armand O. Citarella, *The Relations of Amalfi with the Arab World before the Crusades*, The 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Vol. 42, 1967, P299—300.

〔2〕 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233页。

〔3〕 M. M. Postan and E. Miller, *The Cambridge Economica History of the Europe*,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45.

〔4〕 M. M. Postan and E. Miller, *The Cambridge Economica History of Europe*,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47.

〔5〕 M. M. Postan and E. Miller, *The Cambridge Economica History of Europe*,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45.

〔6〕 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55页。

字军的彩排”〔1〕。基督教的欧洲开始了商业的扩张,这些人大都身兼两职:即武士兼商人。这一系列的武力扩张,可以说是基督徒力图从穆斯林手中夺回地中海制海权的努力。在1090年一支诺曼人征服西西里后,地中海地区的经济格局终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伊斯兰的地中海商业霸权又重新转移到了基督徒手中。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至11世纪末期,意大利商业城市,如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城的海上力量已十分强大,已有足够的财力和船舰来支持西方贵族的“宏伟事业”。这些城市总体来讲都没有强大的陆上力量去夺取地中海东部地区,因此他们虽有垄断东西方贸易、在地中海东岸建立商业据点、排挤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之心,却无实现这一美梦之力。而教皇乌尔班二世发起的十字军东征,则给了他们实现这一图谋的机会,因此,意大利的一些商业城市成了十字军东征最热情的推动者和参与者。

2. 西欧经济复兴与社会矛盾

至10世纪,西欧社会从原先的战争动荡状态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11世纪始逐渐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出现复兴的勃勃生机,西欧封建社会进入了它的发展时期。

西欧封建社会经济活动的复苏和发展,首先表现为农业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农产品产量的提高,即西方史学家常常提到的“农业革命”。中古时期的农业几乎完全支配着经济生活,可能有90%以上的人口是靠土地为生的,因而土地利用的变化及生产方式、生产工具的变化有重要的意义。农业技术的革新主要表现为:一、重铁犁〔2〕的使用,使农民更有效和更快地耕种;二、项圈挽具(马挽具〔3〕)和马蹄铁的采用,使马匹在农业生产中得

〔1〕 M. M. Postan and E. Miller,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urope*, Vol.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46.

〔2〕 重铁犁有犁刀,犁铧和犁壁,三者结合使土地的犁耕变得有效率。使土地深耕成为可能,犁壁将犁起的土壤翻向一边也有利于杀死杂草。

〔3〕 有效的套马方式是中国或中亚发明的,然后传到西方。较早的形式是系在横向车轱上的一条胸带,后来欧洲使用轭状挽具,这种轭具便于使用牛力。用牛轭来挽马,对马非常不合适,还有可能使马窒息。新的马挽具是固定的垫肩挽具,它搁置于马的肩部,能使其自由呼吸,马的力量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由于马挽具的使用再加上马的耐力比牛大,于是在11世纪末的北欧平原出现了以马代替牛用于耕种的情形。西方学者们认为马力代替牛力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但实际上马力并没有完全取代牛力,更多的情形是马与牛共同组成犁队,如二牛三马的犁队,六牛二马的犁队。

到了合理的运用；三、水车、水磨（10 世纪出现）和风磨（12 世纪）的推广和使用，节省了劳动力；四、三圃制代替二圃制，使农产品增加了。

农业技术的革新，使农业生产力有所提高，同时也带来了人口增长。就整个西欧而言，11—14 世纪上半叶，人口高峰时达近 4 000 万^[1]。人口大幅度增长使得庄园的农田越来越难以容纳日益增长的人口，由此刺激了土地的开垦。在西欧，垦殖运动大体自 10 世纪开始，以砍伐森林、扩大林中耕地或筑堤排水为主。在那个时代，被自由或财产的诱惑所吸引，成千上万的拓荒者响应僧侣、主教、君主、领主和自治团体的号召，用所谓砍伐灌木的方法来为进行犁锄耕种铺平道路^[2]，从此西欧到处是拓荒者建立的市镇和定居点。原先森林稠密、地广人稀的地区和国家，森林大部分消失了。大不列颠曾经是西方森林最稠密的地区之一，经过垦殖运动，除了少数残余，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森林了。“许多用 Dten、holt、word、falt、hurst 作字尾的城市和乡村的名称，表明他们的劳动是何等有效”。农业技术的改进和大规模的土地开垦改变了西欧人的生活状况，剩余食物的增加，把人们从农业劳动中解放了出来，使他们可能从事其他劳动，因而使贸易的扩展和城市的复兴成为可能。从 9 世纪末起，西欧城市已开始逐渐增多，11 世纪中叶以后新城市大量出现，许多旧城市也增加了人口，扩大了规模。

尽管 10、11 世纪西欧社会出现了经济复兴的可喜情形，但社会矛盾仍是十分尖锐，其主要表现首先是农民处境恶化。由于人口增加对土地的需求随之增加，造成土地价值上升，也造成无地少地的劳动者数量急剧上升。据估计，11、12 世纪，在英国及欧洲大陆拥有极少份地的茅屋农以及无地劳工构成农村人口三分之一以上。如此多的人口在维持生计的边缘挣扎，遇到荒年则常有饥馑发生，死亡率很高。人口的增长使开垦新的土地成为一种必须的维持地方发展生产的方法，但由于新垦土地一般位于边缘，土地肥力不足，加上肥料缺乏，耕作技术粗糙，往往造成地力枯竭。因此，我们看到了土地面积增加，技术进步，生产力提高的事实，但同时也看到了在人口压力下农业生产所出现的土地严重不足，土地使用过分而造成的地力枯竭以及由此引起的粮食产量下降的情况。可见，西欧封建时代的农业经济基本上是维持着农牧混合经济结构的粗放农业，土壤肥力主要靠畜牧业加以保证，如果农业耕种面积扩大，使用于畜牧业的草地和山村面积减少，容

[1] 王渊明：《西欧人口发展历程》，广东人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1996 年，第 40—41 页。

[2] 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商务印书馆，1985 年，第 232 页。

易出现土壤肥力下降。“毫无疑问,中世纪农民最苦恼的事情,是饥荒……11世纪是一个饥荒严重而又广泛蔓延的时期,无疑的,这引起了居民中显著的不安状态、集体迁移运动以及宗教热情……洛林省和东法,在这一世纪曾遭受两次接连三年的灾荒:一次在1003—1006年之间,又一次在1031—1033年之间,关于后一次灾荒,一个勃艮第的僧侣拉尔夫·格拉勃保存了一种可怖的记载,包括食人的事情。西德意志人和南德意志人,在亨利四世时代,曾遭受九次灾荒,其中两次都连续了三年时间(1060—1062年和1091—1094年),而北德意志在1066—1072年之间,连续遭受了四次谷物歉收。这些灾难,对德意志亨利四世时代的动乱——萨克森人和封建主的叛乱以及授职权战争的暴动——都有一定的影响。在南德意志,12世纪一开始就有着三年的荒灾。到了1125年,德意志和佛兰德斯遍地饥荒。在12世纪中期(1145—1147年),饥荒蔓延全欧……第二次十字军运动,同在1147年发生,它们一定普遍受到这一饥荒的某种反冲力的影响。12世纪的结束象它的开始那样,也有着普遍的灾荒(1195—1198年)。据记载,1032年法国饥荒四起,人们吃完了一切家畜和雀鸟,而饥荒更加厉害地煎逼着人们,人们靠死尸和其他闻所未闻的东西过活。为了摆脱死亡的威胁,有些人挖掘树根和水草,但是这一切都是徒然……许多人挖掘类似粘土的白泥,用这东西来烤面包……他们的颜面惨白消瘦,很多人的皮肤都浮肿或抽缩了。他们的声音变得像垂死的雀鸟叫声那样微弱”〔1〕。1043年饥荒时,列日的主教每隔两周在农奴中分发一次便士,因为害怕他们在饥荒的压力下会出售或宰杀他们的耕牛,从而放弃他们的土地不耕。1053年巴伐利亚的荒灾,所有的农奴逃亡,很多村庄被遗弃。在1196年的大灾荒里,许多人被迫向外迁徙……狼群充斥在路上,甚至毫无惧惮地闯入了村庄。然而就是在粮荒时,封建主还囤积了谷物,为的是要待价出售。社会内在的压力,再加上那个时代特有的宗教氛围,下层民众很自然地把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夺回圣地的十字军号召当作摆脱贫困与饥荒,到东方寻找“乐土”的难得机会了。

与此同时,11、12世纪,西欧贵族的继承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确立了长子继承制。这一变化增强了西欧社会内在的压力与矛盾。西欧贵族继承方式的改变是与婚姻、人口、社会经济和文化心态等因素的变化有密切关系的。在中世纪早期日耳曼人建立的各个国家中,婚姻形态比较混乱,当

〔1〕 黄春高:《西欧封建社会》,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第257页。

时的婚姻,既受到罗马时期一夫一妻制婚姻形式的影响,尤其是教会婚姻观念的影响;同时又保留了日耳曼人原始社会残存下来的多妻制和蓄妾制,血缘姻亲大量存在。但从8世纪开始,事情有了变化,婚姻逐步走向正规化。先是订婚代替私奔,后是对近亲通婚作出限制,规定七代之内不能结婚,婚姻变得越来越神圣,其仪式成为七项圣礼之一^[1]。婚姻一经缔结,便成为契约,婚姻契约的解除须经主教的允许。这一状况在历史上被称为“婚姻革命”。经这一变革,结婚同建立家庭的经济条件联系起来,只有具备了经济独立条件的人才能谈论婚媾,这样西欧确立起了地产的长子继承制。

在11世纪之前,西欧的继承方式大致有:长子继承制,幼子继承制,诸子析产制^[2],其中较为盛行的是诸子析产制。这种继承方式在10、11世纪时曾引起了一场“贵族危机”。据法国史学家乔治·杜比对马康纳地区贵族的研究,发现这一地区在10世纪之前贵族地产继承盛行诸子析产制,当地200平方公里的地产上有105个富人,他们同加洛林王朝时期的古老贵族家庭具有一种关系,这105人分别于344个家族,其中的28人又分别属于6个古老家族,杜比进一步对这6个古老家族跟踪调查发现到1000年时,经析产已经分化为24个家族,大贵族的后裔因此而变成了小贵族^[3]。而一些小贵族也因诸子继承地产而式微,其后裔成了一般农民。在当时贵族的地位与身份需要相应的经济地位来维持,也就是需要一定数量的地产作保障。据估算,当时要武装一名骑士(包括骑士使用的马匹、军械和侍从等),其费用大约需要10个面积为5平方公里的庄园,即约50平方公里的土地,若地产少于这个面积,贵族的地位与身份就会受到丧失的威胁。这对贵族家庭来讲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迫使他们努力保持其领地的完整性。对此乔治·杜比在《900—1500年,中世纪的农业》中提到,对教会馈赠土地和遗产划分的习惯,逐渐把世俗贵族的财产侵蚀殆尽。在11世纪的最后几年里,还发生过保护性措施:法律裁决逐步采取了在继承人中间放慢遗产的瓜分,由家族控制共同继承人的赠予权,以限制他们对宗教机构的慷慨行为^[4]。可见,地产分割对贵族造成的威胁,在当时很普遍,也

[1] 七项圣礼:指基督教会规定的七项礼仪,即洗礼、坚振礼、忏悔礼、圣餐礼、婚礼、神职礼、终傅礼。

[2] 日耳曼人中存在子女共同分割财产的习惯,诸子与女儿可以共同继承父亲的财产。

[3] 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104页。

[4] 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60—161页。

很严重。因此,贵族们逐渐改变了继承方式,确立起长子继承制,随之家庭形式由复合形大家庭向单子式小家庭转变,建立起了以父系为主导地位的家庭。由于实行长子继承制,就不能给诸子以土地或其他形式的地产分割,而一个人没有土地就不能结婚,贵族子弟只有在继承地产后方能结婚。在长子继承制下,贵族幼子往往难以正常地继承遗产,他们的出路或是进教会当教士或者是设法找到有地产的女继承人。于是有钱的寡妇成为众人追逐的对象。此外就是为国王和大贵族服役,争取得到一块封地,否则他们只能到处游荡而婚姻无着落。难怪法国阿奎丹公爵领的女继承人埃莉诺与法王路易七世离婚后,马上就有众多追求者,因为她是欧洲最富有的女继承人,最后30岁的她嫁给了年仅19岁的安茹伯爵,即后来的英王亨利二世。亨利·皮朗在谈及未得到封地的贵族幼子时也说,“曾经征服了南意大利,随着威廉大公入侵英格兰,并成为第一次十字军中多数士兵的诺曼底冒险家,就是从这些人(未得到土地的贵族幼子)中间招募而来的”〔1〕。德国史家诺贝特·埃利亚斯在分析十字军东征发生原因时认为,当时的西欧社会人口在增长,土地,最重要的生产手段……甚为有限。在国内开垦,开拓新土地远远不能弥补土地的短缺,于是不得不在境外寻找新的土地。从10世纪末起到11世纪,对土地的压力逐步加强,对新领土的渴求,在西法兰克地区日益显著,早在11世纪初诺曼骑士便进军南意大利,那里的一些国君也雇佣他们来当武士为其服役。1029年他们中的一员因其服役有功而在那不勒斯公国北部世界得到一小块封地。其他骑士也紧紧跟上,其中便有小诺曼庄园王唐克雷德·德·豪特维尔的儿子们。这个庄园主共有12个儿子,光靠父亲的土地他们如何过日子?于是8个儿子去了意大利,在那里他们慢慢地争得了在家乡无法争到的东西:对一块土地的拥有权。他们中的一位名叫罗伯特·吉斯卡,在战斗中还渐渐成为公认的诺曼武士的首领,在其领导下诺曼人从1060年开始向西西里岛进击。

在西班牙也发生了与此相类似的情况。早在10世纪,法国骑士就已参加西班牙的基督教国君攻打摩尔人〔2〕的“收复失地运动”〔3〕了,直到11

〔1〕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0—61页。

〔2〕 摩尔人:指中世纪在西班牙的穆斯林。

〔3〕 收复失地运动,又称为“列康吉斯达”(Reconquista),意为“再征服”,西班牙历史学家认为这一事件始于718年,至15世纪西班牙占领格拉纳达为止,11—13世纪的战争最为激烈。

世纪中叶,还有三五成群的基督徒翻山越岭向西班牙进发。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率领由诺曼和法国骑士组成的大军渡过海峡侵入英格兰,争得了新的领地。此后,1095年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已有一队人马在一位名叫瓦尔特·哈伯尼希兹^[1]的率领下进军耶路撒冷,结果在小亚细亚全军覆灭。法国史家拉塞尔在研究了500年—1500年欧洲人口问题后提出:1000年前后贵族或王室的子女突然增加,可能是由于雇用了保姆喂乳……中世纪,封建势力在“挥师东征”、“重新征服”以及十字军东征等鼓舞下极力扩张,部分原因可能是封建领主的家庭普遍存在高人口出生率^[2]。当然,因贵族家庭人口增多,幼子无封土等造成的矛盾乃是西欧封建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在中世纪自然经济下,人们所追求的不是赚取越来越多的货币,而是越来越多的土地,即地产形式的财富。

11世纪的西欧社会正处于这样一种内在矛盾的紧张之中,社会内部的紧张状态不仅表现为对土地和面包的渴求,而且对整个人的心灵也是一种压力,社会压力即为动力,它会使人蠢动起来,而基督教会在这种已有的矛盾加以利用,引诱骑士们手拿宝剑去夺取新的土地和财富,并把这种赤裸裸的夺取与扩张变成为信仰而斗争的“圣战”。

3. 克吕尼改革运动

克吕尼运动始于公元910年法国南部的克吕尼修道院,它的发生是西欧政治形势发展的产物。

法兰克王国自查理大帝去世后陷入了四分五裂之中,在法兰克王国解体、封建割据加剧的过程中,势力已十分强大的基督教会趁机摆脱了法兰克皇帝的控制。按照原先查理大帝时宗教会议的规定,主教违反了效忠皇帝的誓言就褫夺神权,但查理大帝去世后,一些主教开始对皇帝委派平信徒担任修道院长以及皇帝随意下令收回教会产业的做法表示不满,到858年,出现了这样一件事,一批主教联合写信给查理大帝的孙子、日耳曼人路易,宣布此后不再履行向皇帝效忠的手续了。与此同时,主教与世俗贵族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加剧,主教们抬出罗马教皇的权威来对抗世俗贵族。罗马教皇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宣布一批富裕的修道院应归罗马主教

[1] 一说是高提尔·森察伏(Gautier Senzaroir)。

[2] 奇拉波:《欧洲经济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1页。